

魏宏运文集

抗日战争与 中国社会 下

魏宏运 著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编

魏宏运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抗日战争与 中国社会 ●下

魏宏运 著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编

魏宏运文集

《魏宏运文集》编选组

总负责人：

江 沛 邓丽兰 李金铮

分卷负责人：

《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杜恩义

《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上)》：刘依尘 王 希

《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下)》：冯成杰 王 希 刘依尘

《序跋与书评》：何悦驰

《忆往与治学》：张耀元

《魏宏运年谱》：王 希 张耀元

敌后抗战研究



抗战初期范筑先的爱国情操

抗战初期华北的地方社区规划官吏,大都患着沉痾般的恐日病,抱着所谓不抵抗主义,敌军来到,有的逃跑,有的当了汉奸,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都率部逃走了,使日军得以横行无阻。1937年12月24日,日军占领了济南。青岛市长沈鸿率领海军陆战队也逃走了,烟台、青岛、威海卫也都相继沦陷,敌人侵略的声浪,终日终夜传播着,汉奸又兴风作浪。人们都抱着惶骇的心情,时时关切地探听着当局的动静和敌人的消息。当时只有鲁西北即黄河以北津浦线以西一带还是一片干净的国土。

这一片干净的国土,以聊城为中心共有20多个县。聊城是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管辖有12个县,行政专员同时兼保安司令。这12县是聊城、茌平、博平、堂邑、冠县、朝城、观城、濮县、范县、阳谷、莘县和寿张。日军进犯山东时,山东各行政专员于10月17日均被委以游击司令。范筑先保安司令也改称游击司令。

范筑先(1882—1938),山东省馆陶县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家,少年辍学,曾给贩粮人推车,以养家糊口。后来卫河泛滥,无法维持生活,范遂离家从戎,1907年到天津马厂,入北洋陆军第4镇炮兵第4标第3营右队第1棚当备补兵,继到第4镇随营学堂学习。辛亥革命时范任第4镇连长,随后任营长、师参谋长、补充团长、旅长,隶属浙江督军卢永祥部。1929年投入冯玉祥西北军第13军军长张维玺部,任高级参议;“九一八”事变后,任山东第三路军少将参议;1932年冬至1936年5月先后任临沂、沂水县长;1936年11月始调聊城。

范是一位正直廉洁的爱国人士。1937年4月,周恩来派彭雪枫到山东省开展工作时,已明确表示,应争取范接受中共抗日主张。范愤恨国民党当局的丧权辱国,有和共产党合作的思想基础。抗战开始,中共山东省委派在专署任职的张维翰、赵伊坪和范联系。10月上旬,张维翰、姚第鸿率第三路军政治工

作训练班学员 240 多人到聊城范部工作。“这 200 多青年,有的是在北平的大学教书的教授,有的是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留学生,有的是平津的学生或是从事文化事业的工作者。”^①

1937 年 10 月 16 日,日军占领临清、高唐,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下令津浦路以西、黄河以北的专员和县长限期完全撤退到黄河以南,许多官吏都不得不遵命而行。范筑先曾率领部属向黄河以南撤退,委张维翰为聊城县长,配给 27 支枪。范率部南下,经两天抵达齐河县官庄,没有过河。刚刚到达聊城的 240 名政工人员也随军行动。据孙思白回忆:“这件事的发生使我们这些无经验的青年人感到不知如何是好。一阵议论之后,我们中的大多数茫然地跟随他沿着来的路又往回走。”^②在齐河,范召集部属开会,决心班师。这时,张维翰也赶来了。张守聊城仅一日,就被从前方溃退下来的齐子修部骗开城门,缴了械。范因此更坚定了回师的决心。他说:“大敌当前,我们守土有责,不抵抗就撤走,何颜以对全国父老。我决心留在黄河以北守土抗战,愿随我回去的就留下,不愿回去的就渡河南退,决不勉强。”随后,他给韩复榘打了电话,表达了回聊城的决心。

经过这次撤退和返防,范受到教训,表示今后不论再遇到什么紧急情况,决不再退。为了激励部下,他慷慨激昂地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家要效法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力挽狂澜,救民水火。要誓死守土,抗战到底。不论何党何派,抗战者一律欢迎,不抗战者,即我亲兄弟亦所不容。”

韩复榘匆匆南逃时,再次命令范筑先撤退。范当时正在博平西关,思绪万千,不能成眠。此时,中共山东省代表张霖之已来到聊城,帮他分析形势,剖析利害。他又一次拒绝了南撤命令,并决定通电全国,表明心迹。回聊后,他主持会议,11 月 19 日发出通电,庄严宣告:“既自倭奴入寇,陷我华北。铁蹄所至,版图易色。现我大军南渡,黄河以北,坐待沉沦。哀我民众,胥蹈水火。午夜彷徨,泣血椎心。筑先忝督是区,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武装民众,与日寇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鞠躬尽瘁,亦所不辞。所望饷项械弹,时予接济,俾能抗战到底,全其愚忠。引颈南望,不胜翘企。”这

^① 北鸥:《山东的西北角》,《大公报》,1938 年 2 月 17 日。

^② 孙思白:《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的见闻与断想》,《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5 年,第 141 页。

一电文名曰“皓电”。

鲁西北当时有土匪、民团二十几股,少则数百人,多则一两千,大股的更有四五千。还有一些国民党溃兵,打着抗日旗号扩充势力,范的部下仅有一个保安营,形势很严峻。范紧紧依靠共产党,一面建立反日武装,一面发展抗日政权。

共产党在鲁西重组鲁西北特委,由赵健民、徐运北先后任书记,还派张霖之以省委代表身份,赴聊城领导鲁西及鲁西北工作。赵健民、张霖之、王幼平都在范部政训处任职,张郁光、张承先、齐燕铭、任仲夷、成润、牛连方、袁仲贤等先后到范部工作。

为恢复和建立抗日政权,他改革了行政机构,亲赴各县视察,先后委任有所作为的青年共产党员担任冠县、莘县、寿张、濮县、阳谷、范县、馆陶、邱县、齐河、高唐、汶上等县县长。每县都设有政训处办事处,极力刷新县政,推行廉洁制度,铲除贪污,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废除苛捐杂税,切实执行合理负担,积极提倡民主与开展民众运动,各种抗日群众组织都发展起来,如聊城妇女救国会、聊城战地服务团、聊城青年救国会、聊城儿童救国团、儿童剧团、冀鲁青年记者团等。各种报刊也出版了,如《山东人》《抗战日报》《先锋月刊》《战地新闻》《战地文化》《战线》等。为培训干部,范在博平办起军事干部训练班,在寿张办起政治干部训练班,还成立了政治干部学校,范自兼校长,张郁光为副校长,齐燕铭为教务长;成立了军事教育团,袁仲贤任教育长、胡超仓任训育长;还办了随营学校。这种革命气息在当时的山东是绝无仅有的。

范以惊人的力量,处理自己面临的复杂局势。他的基本观点是,在全民族抗战中,有血气的中国人都不愿当亡国奴,都可以成为抗日的力量。他因此努力扩大抗日武装,收编了大批游杂人员,在返防回聊途中部队扩大为5个营,2000多人,其中包括一部分窜入聊城的齐子修部,并抽调二三十名政工人员编成青年政工队,随军行动,负责侦察、联络、通讯等任务。

范筑先有勇有谋,在收编溃兵和绿林过程中,表现出非凡的才干和胆量,如收编齐子修部时,对方摆开阵势,架起机枪,杀气腾腾,如临大敌。而范只身骑着自行车前往,与齐见面就说:“你们这点人马跑来跑去,还不叫鲁西北的民众把你们吃掉吗?我们国家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正是为国效劳的时候,不要乱跑了,跟我抗日去吧!”齐子修无言以对,遂同意范将其收编为抗日游击第3营。在收编绿林方面,更有许多传奇性的故事,他多次先用兵包

围,而后单人入虎穴。冠县土匪武装韩春沙被编为范的第5支队,就是采取这种办法。范仅带卫兵20余人。韩的传令队六七个人,皆手持匣枪,大张机关,气氛紧张,其他部队也待命行动。范一见韩就说:“我是来救你们的!你们要学民族英雄,抗御外侮。要归我收编为抗日部队,走抗日救国的道路,当土匪是没有出路的。”当时,韩部正围攻李辛村,韩提出要李辛村投降才受编。范当即正告说:“你们现在是土匪,民众才抗击你们。成了抗日军队,严守军纪,任何村寨都欢迎你们。”韩部终被收编为抗日游击第6支队。就这样,范收编了散杂武装和土匪约5万人以上,共组成35个支队。

此时,由中共党组织直接建立的武装是堂邑县第一游击大队。该支队全是由青年政工人员解彭年、李福尧等人领导组成的。该支队最初只有几十人,都是学生,后发展成为范部的第10支队,完全按照八路军的风格组成,张维翰兼任司令,王幼平任政治部主任,是范的一支主力军。

范仿照第10支队的办法对其收编的部队,普遍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他严格约束那些接受改编的土匪、民团头面人物,对遵守军纪作战有功者给予提升和重用,对畏敌不前、违反纪律者处以严罚,对心怀二志不积极抗战者予以撤换,使各部队较快地步入了抗战轨道。

大批政治工作人员都被派到乡间去巩固游击战争的基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游击队的组织在鲁西北广泛展开,并且开始迎击敌人。1937年11月以后的两个月,他们接连伏击了从临清南下的高桥联队,从津浦路来的日军步、骑混合队,先后经历了堂邑境内梁水、界牌、柳林战斗,博平境内徐河口战斗,茌平境内南镇战斗。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2月,游击队共经历20多次战斗,其中以南镇战斗最激烈,打了4天,歼灭了来犯之敌,获得军马、汽车、摩托车、枪支、地图、军用品极多。1938年春,濮县血战三次败敌,夏季东阿、临清之役击溃敌人收复临清,肃清了伪军。在与伪军激战堂邑、馆陶、高唐、万堤等地,结果肃清了伪军。在反攻济南时,令其幼子亲率连队,直扑敌营,致落于难。这些战斗规模都不大,但影响很大,表明山东的西北角不是日军可以随意横行的。

鲁西北本多平原,并无天险,而游击战争在短期内在20多个县都展开了。游击武力有三种:一是游击支队,约6万人,有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在全区内展开战斗;二是县游击队,人员约6000人;三是自卫团,即各村镇的民团、红枪会所组成的自卫组织,只在家乡而不出动游击。这种人数极多,有数

十万,只是枪支并不齐全。这一地区是大刀会、红枪会、梅花拳最活跃的地区,绝大多数民众这时都走上了抗日道路。

组织起来的群众,拿着枪在田野里、在草垛旁,机警地潜伏着,英勇地不断同敌人战斗。尤其是范筑先,每当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总是不顾性命地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来去,猛烈地冲锋。柳林一役,他亲自在火线上指挥作战,敌人冲过来了他仍然镇定沉着地指挥。

鲁西北素来贫瘠,人民生活很苦。这些军队和游击队都是就地筹措军粮。他们没有薪饷或只发零用钱,生活非常艰苦,吃的是苞米饽饽、地瓜或苞米做的稀饭之类,穿得也很困难,有的到12月还穿不上棉衣。但在抗日第一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口号下,为了保卫祖国和家乡,他们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

农民看到范筑先及其军队的爱国表现,理解了游击战争。军民因此联合起来,打成一片。每当六区游击司令部运输子弹经过乡村稍有逗留时,当地的乡长或村长便立刻召集壮丁放哨保护。六区游击司令部或者六区游击司令部的战斗员,过任何乡村的时候,农民无不热烈欢迎,诚恳款待。比较富裕的农民自动地把埋藏在土地里的粮食拿出来供游击队做给养。

游击队每次获得胜利品,总要分发给当地民众。当民众晓得敌情时,也总是通风报信,告诉游击队。群众已成为部队活动的耳目。

范筑先和中共合作,携手抗日,还表现在1938年6月14日他到冀南会见徐向前,商谈抗战问题。冀南和鲁西北力量从此连成一片。^①

1938年1月13日夜,沈鸿烈继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沈是一名反共分子,以政府名义逼迫范县、寿县政权,让复兴社分子接管政治部,解散共产党领导的所有支队,编入保安旅;1938年7月设立鲁西行署,先驻聊城后移寿张县秋镇。“沈鸿烈军设鲁西行署的目的,起初是基于对范筑先的不放心,掣肘范筑先的亲共活动,对分化瓦解范的部队,破坏范与共产党的统战关系,起了很坏的作用。”^②在反共的恶浪中,一股民族败类的土豪劣绅,组织了所谓“忠孝团”,提出反对第六区的口号。范筑先在内外敌人和恶势力的围攻中,毫不畏缩,始终坚持抗战路线,成为抗日战争的一面光荣旗帜。

范筑先的伟大,更表现在他在危难之时对生死所持的态度。

① 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140页。

② 吕伟俊主编:《民国山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4页。

1938年1月13日夜,敌伪军千余人配合飞机大炮,向聊城、临清、南宫等地进犯,各地游击队、保安团当地布置防御,与敌抗争。因敌军炮火猛烈,各县城相继沦陷。进犯聊城之敌伪军,迂回将县城包围,于15日拂晓以3架飞机掩护,装甲车20余辆猛攻。^①范筑先率领卫队走上东城,在城墙上督战,张郁光率领青年把守南城,城的四周都开始了激烈的战斗,范部一面向空中射击日军的轰炸机,一面向敌人的马队和步兵打去,毙敌300余人。东城的战事最为激烈,范的卫队只剩下20余人,南城也很吃紧,青年们伤亡了一半。在对抗中,西门被敌军冲开,西大街已展开巷战。此时范的一个随员劝范从北门冲出去,再做收复城池的准备,范走到城东北角又折回来,大声喊着:“我范筑先能悄悄地溜出去吗?我将有何颜再见鲁西北二十几县的父老兄弟。”他又跑到城墙上,卫队也紧随其后。范将身上剩下的8颗子弹,向城外的敌人放了7颗后,高呼:“中华民族自由解放万岁!抗战建国胜利万岁!”然后将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射去,他的卫兵感范之忠勇,为国捐躯,也都倒在城墙之上。^②张郁光以及聊城县长、警察局长也均以身殉城,这么多的人,竭尽所能地成为不愧为中国人的人,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人的死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他们为人民利益而死,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人们都以他们的勇气做自己的养料。

范筑先牺牲了,他创建的30余支队继续在战斗,而鲁西北这块土地则成为中共在敌后建立的冀鲁豫根据地的基石。

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① 《抗敌报》,1938年12月27日。

② 臧云远:《聊城血战记》,《大公报》,1939年11月15日。

八路军和新四军反限制斗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开赴的地区是晋东北日军的后方,新四军所接受的作战区域是南京附近 500 里长、150 里宽、靠近长江沿岸的狭长地带,国民党军政部下令该军不得擅离该区。从这一部署不难看出蒋介石集团的阴险: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并幻想借日军之手消灭八路军、新四军。

蒋介石曾答应要发布正式承认边区政府的命令,但却始终没有正式发布。不仅如此,从 1939 年起,蒋还在边区周围驻屯 20 余万军队,发动民夫修筑 5 道封锁线,其结果与愿望相反,陕甘宁边区日益巩固壮大。

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冲破了蒋介石集团所规定的防地,向日军占领区猛烈进攻,摧毁了日伪政权,建立了一块块游击区和根据地,组成了抗日民主政府,将革命势力推进到沦陷区,如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南京、上海等地,真正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使敌伪的统治未能越出各城郊的 10 里之外。

敌人若要出城,须有军队的保护,否则便为游击队所消灭。八路军、新四军从日伪手中解放了大片国土,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凡属国人,无不欢欣鼓舞。如果八路军、新四军只在规定的防区内,那只有坐以待毙,沦陷区人民所遭受的灾难不知会成什么样子,整个抗日战争的局面也是不堪设想的。

反限制的胜利,鼓舞了人民抗日战争的士气,同时也灭了敌人威风。国民党认为,敌后抗日力量的增长是可怕的事情,并阴谋以少发军饷、甚至不发军饷的手段,使八路军、新四军难以生存下去。但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从抗战开始,延安就采取边扩边建的方针。各根据地都着力解决财政困难,其办法是开源节流,把发展农业工业生产放在首要地位,以征收田赋、进出口税,发行救国公债,征收救国公粮,发行货币等手段,满足军政费用,实行统筹统支,使收支保持平衡。从晋察冀边区部队的供给可以看出统筹统支是有计划进行的。每年 6 月以前,驻扎在各地保卫边区的部队,给养完全由各地

县政府统筹支付。6月20日以后,所有边区部队的给养,由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统筹统支。服装方面,由各部队计算所需件数,将清单交由边区政府统一购买土布,发给各部队自行染装。鞋袜由政府经农会动员村中妇女制作。弹药方面,由政府统一价格,收买民间所藏枪械子弹,并用破锅碎铁改制武器,按照需要分发各部队。这些办法使部队的生活得到一定的保证。

军火的供应也不再受国民政府的限制。八路军刚到敌后,便收集民众私藏的武器,从散兵游勇中得到一部分枪械。一些地方的基层政权也帮助提供一些枪械和给养。更主要的则是从敌伪手中夺取。正如《游击队之歌》所唱的:“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八路军、新四军不仅获得了最新式步枪,还有了三八式的轻机关枪、自动步枪。国民党对军火供应的限制,反而促进了敌后军火工业的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在各地所设立的军械所、铁工厂和兵工厂均能制造来复枪和炸弹、手榴弹等。各军区都有自己的军械所。技师是京津一带具有冶金技术的知识分子,有的曾留学欧、日等地。工人多是原来太原兵工厂工人,太原沦陷后,流散到各地,他们成为根据地军火的制造者。

1940年,敌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已拥有23个师的兵力。国民党无可奈何,又要出新花招,提出:新四军尽移江北;江北等处划定界限,共产党发行的3000万纸币,重庆负责以法币兑换;共产党不得再扩张等等。然而,国民党所策划的一切限制手段都失败了。蒋介石将国共关系推向全面对抗地步,于1941年1月发动皖南事变,其结果新四军固然遭到严重损失,但国民党在政治上损失更大。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同声谴责蒋介石制造内战的罪行,国际舆论也站在共产党方面。

这时中国共产党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中共中央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自此以后,八路军、新四军进一步发展起来,推动着抗日战争的进程,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回到抗日统一战线的道路上来。

原载《光明日报》,1999年3月26日

华北抗战和八路军

日本的近代史充斥着“侵略”二字。甲午战争,日本占领了我国台湾;日俄战争,“南满”成为它的势力范围。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轻易地夺取中国东北,制造出一个伪满洲国。接着就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以及关东军特务专家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人又策划“华北自治运动”,物色了一批北洋政府时期的官僚、政客,如齐燮元、王揖唐、江朝宗、朱深等,为其效劳,华北地区急速地变了颜色。

1935年,日军已控制内蒙古一半和华北五省相当部分的地方政权,在“反共”和“亲日”的口号下,成立了以德王为首的“内蒙古政府”,以通州为“首都”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还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政治形势如此,经济也为日本所控制、所垄断,天津的纱厂在华北是相当著名出色的,到1936年,裕元、华新、宝成都已为日商所收买,1937年初,裕大纱厂也为日商所经营。天津日商洋行林立,多属经营毒品。日本浪人则从秦皇岛登陆,武装走私日货,破坏华北经济。“华北已没有一片净土”,这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学生的强烈呼声。

日本认为它占领华北的道路已经铺平,只要稍微动点武力,就不难征服华北及整个中国。根据日本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相决定的“华北指导方针”和东条英机建议,日本华北驻屯军,选择卢沟桥作为发难地,向中国当地驻军开了第一枪,日军指导部认为占领卢沟桥就可以切断华北与华中的联系,实现它的阴谋。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八年,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正式在密苏里战舰上签订降书为止。战争的残酷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日军的残暴和恶毒,破坏了世界的文明,犯下了永远洗刷不掉的罪行。

战争初期,日军趾高气扬,半年时间就占领了平津京沪,1937年12月在北平又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名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网罗了一些民族败类,为其效力,将占领台湾和东三省所施用的一切毒辣手段,都照搬到华北来。它未曾料到,这肆无忌惮的侵犯遇到了中国人民殊死的抵抗。在华北,它占领的地区只限于铁路沿线和较大的城镇,广大的农村都在中国游击队控制之中,“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号令出不了“首都”十多里以外。当时是国共合作的时代,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共4万多人,其中3万多人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于9月由陕西赴山西战场,这支力量出现于前线,中国华北战局立即起了根本变化。

八路军是一支有坚定信念、坚忍不拔、勇敢刚毅的部队,它蔑视日军,勇于作战,在其展开战略部署前,周恩来前赴山西,9月3日到了太原,指点江山,鼓励、促使阎锡山坚定抗日信念,向阎介绍了八路军的作战方法,向阎建议在晋绥沦陷区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这些无不得到阎的称赞。周恩来还实际考察了山西的诸条件,就八路军如何部署和注意扩大自己部队、动员群众参战、组织抗日游击队等问题,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意见,并得到毛泽东的赞许和同意。有了这样的工作基础,八路军迅即展开了战略部署。

八路军首次展示自己的威力,是获得平型关大捷,只此一役使不可一世的板垣师团吃到苦头。

不止战场上是日军的强敌,八路军又是抗日战争的巨大推动力,它每到一地,派出工作团,组成战地动员委员会,在各县、区、村掀起动员的热潮,很短的时间内,在一个县内,常常由几个人的队伍发展为几千人的队伍。老八路就领着这些新部队和地方人民武装,处处打击敌人。

侵犯华北之初,日军异常张扬。1937年10月,日军已在其占领区内张贴“保定、沧州均已沦落,肃清华北,业告成功”的标语,以蛊惑人心。11月8日,日军占领太原,更认为它已征服了华北,一切都没有问题了,进犯山西的日军大部分撤退,运回东北或运到山东方面作战。就在日军沉醉于自己“胜利”的时刻,八路军115师在晋察冀地区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129师挺进晋东南,120师在太原附近和晋西北,天天和日军作战。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军已伸展到平汉铁路以东,北平、天津和保定也在他们控制之下。

北平虽被日军铁蹄践踏,而北平周围,却已有中共地下党员组织的平西

游击队、东北义勇军的流散部队和许多村庄的联庄会等 20 多支游击队,都在和日军展开斗争。1937 年 11 月,平西游击队并入八路军建制,活动于宛平、昌平、房山、涿县和涞水一带。在天津有中共河北省委领导的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抗日的烽火燃遍全国,一位外国记者当时考察了华北局势,于上海《华北日报》上发表了她的见闻,说:“整个河北的中部和南部充塞着艰苦奋斗的华人,他们一部分是被解散的兵士,一部分是田园被毁生计丧失的农民。日军非有强有力的部队,否则不能侵入这些区域。”平汉铁路、正太铁路不得安定了,经常受到从山上下来的游击队的袭击。日军企图消灭八路军,只是梦想。

华北和东北不同,“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可以很快地组织伪军,在华北,日军也组织守备队、“清乡”队和自警团,但这些组织都空虚无力,少数老牌汉奸所组织的维持会,从事的是替日军拉夫派粮、搜寻妇女的勾当。汉奸之不仁,老百姓无不愤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记述了日军许许多多的暴行,汉奸的丑态,红军(八路军)的英勇,足以折射当时华北人民的抗日意识。

“华北是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不会被征服的!”这是当时人们喊出的豪言壮语。1937 年晋察冀根据地粉碎了日军的八路围攻,1938 年晋东南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1938 年 2 月又出现了有 7 万人参加的冀东大暴动。八路军的威力,使敌人不得不相互告诫:“华北有八路军是不能安枕的。”

1939 年,有两首歌曲风靡全国,一是《黄河大合唱》,一是《我们在太行山上》,非常鼓舞人心。我当时在西安,是初中生,直接感受到这两首歌曲的力量。太行山战场是很吸引人的,不知有多少青年因此走上华北抗日战场。

太行山根据地成为敌后抗战的一盏明灯,太行山革命的发展是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1940 年,当欧洲被德国所征服,亚洲被日本所践踏,世界处于黑暗之日,中国华北于正太铁路爆发了百团大战,充满了中华民族精神,赢得了骄人荣誉。太行山儿女所表现的英雄气概,是不可磨灭的,永远载入史册。

那时太行山已成为一种无声的威慑力量。1941 年到 1942 年,日军对华北曾进行了多次毁灭性的“扫荡”,和以往不同的是,“扫荡”几乎没有间歇,“满”“蒙”与华北三地区敌伪协调统一进攻,施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并村归屯,划“人圈”,制造无人区,在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等边界地方,实行“绝缘政策”,如五台县跑泉到孟县上社,长 200 余里,宽五六十里的无人区内不许任何中国人存在。日军强迫人民修筑封锁沟和碉堡,小碉堡占地 3—4 亩,大碉堡占地 8—9 亩,也有占地 15 亩的,农家良田都被日军毁坏。当时有一首

歌谣,描绘日军的野蛮行径:“山药蛋饭稀汤,从早到晚把夫当,不去,用枪挑,晚了,跪沟旁;亡国奴,真难当,有家没法住,天天净出夫,砍光村边树,好地开汽路。”至1942年,日军在河北修筑的碉堡达7700座,修的封锁沟长达11860余公里,约等于绕地球一周的1/4,平均每三四里长的封锁线上就有一座碉堡。这是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供出的罪行。日军给华北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1942年,华北各根据地的城镇几乎全被日军占领,日军的残暴骇人听闻,如冀中平原,无村不戴孝,到处闻哭声。日伪又实行“治安强化”政策,要使八路军没有活动的空间。华北成为恐怖世界。在人民无法生存的条件下,日军又提出华北为其兵站基地,以支持它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而这一年又是旱灾,收成极少,富饶的冀中平原收成也不过五成。日伪还到处抢粮,老百姓无法生活,多以野菜、树根树皮树叶充饥。1943年5月3日,伪《申报》登载北平通讯,报道了平津两市的惨状:“华北最大的都市平津两市发生空前的饥饿的恐怖,小康之家及中等以下的薪水阶级,生活陷于恐慌,多数机关小职员、小学教员,昼间办事教书,夜间驾三轮车,兜揽乘客,以求补助。拖着乘客跑的黄包车夫,随时有晕倒街头一瞑不视的,原因是腹内空空,力尽气绝。据调查,3月份内,平津两市,每日各有二三百人因饥饿而死。”“至于华北乡间的饥荒,更为惨痛,距离北平以北30里的汤山一带,居民即以草根树皮为粮。山西、河南、河北,有些地方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至这一年5月,天津市民沦为乞丐而流浪街头者达25万人,北平市民每日死亡人数由300人增至500多人。日军将华北变成了人间地狱。

就是在这样极其险恶的困境中,八路军并没有离开华北,他们在太行山中继续和日伪周旋,采取一切手段破坏封锁沟,派出武工队到敌占区推进、繁殖游击战争。当时的口号是“向敌后的敌后进军”。经过长期坚持,一点一滴地巩固和发展,到1943年下半年,各根据地得以逐渐恢复。到1944年,华北又出现了新的局面。华北是中国人民的,这是历史的答案。

一些日本年轻的学者多次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时那么强大的日军机械化部队,消灭不了八路军,摧毁不了根据地?”我总是讲:日军是在中国领土上作战,是不义之战,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在山地是无法活动的。八路军不依靠交通线,在日军的侧翼或后方,能独立自主地作战,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与保护,可以迅速获得日军行动的情报,又可以机密地封锁自己的军情。这就使日军难以速战速决,难以实现其灭亡中国的狂妄迷梦。刘大鹏 1940年9